



高等教育国际视野丛书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F HIGHER EDUCATION

主编 庄辉明 谢安邦 任友群

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研究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实践和启示



田爱丽/著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MODERN UNIVERSITY CORPORATION

INSPIRATION FROM THE CORPORATIZATION
OF JAPANESE NATIONAL UNIVERSITIES

上海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国际视野丛书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F HIGHER EDUCATION

主编 庄辉明 谢安邦 任友群

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研究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实践和启示

田爱丽/著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MODERN UNIVERSITY CORPORATION

INSPIRATION FROM THE CORPORATIZATION
OF JAPANESE NATIONAL UNIVERSITIES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研究: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
实践和启示 / 田爱丽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9

(高等教育国际视野丛书/庄辉明,谢安邦,任友群主
编)

ISBN 978-7-5444-2504-9

I. 现… II. 田… III. 高等学校—法人—制度—研
究—日本 IV. G649.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4413 号

高等教育国际视野丛书

主编 庄辉明 谢安邦 任友群

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研究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实践和启示

田爱丽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4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本

ISBN 978-7-5444-2504-9/G · 1971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曾一直以富庶、文明和广泛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商人而享有盛誉。但就在欧美各国历经几个世纪创造出现代工业文明形态，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工业化浪潮的同时，中国却因为封闭而落后了，甚至在1840年后渐次沦为列强争相掠夺的对象。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尝试接纳工业文明，并使之与中国的传统建立恰当的联系，在传统经济形态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1978年后，中国开始谨慎地尝试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恰逢其时赶上了“二战”后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历经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已经得到显著提升，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近10年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领域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迄今为止，就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而言，就知识界、科技界对世界文化、科学、教育发展的贡献而言，中国仍显不足。

实际上，约11世纪出现的第一批欧洲中世纪大学，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欧洲城市化进程的自然产物，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国性机构：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师生，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独特的学术组织与结构。从17世纪开始，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建立起来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系统，使得大学开始走向相对的封闭。跨国学习不再是分享共同的知识与经验，而是寻求所选民族国家相对先进的观念和科学的成功经验。“二战”后，跨国学习则转变为一种基于服务贸易全球化的产业结构的组成部分。当然，高等教育全球化决不只是跨国学习这么简单。欧美国家在推销其工业化生产方式和民主、自由的政治模式时，丝毫都不掩饰它们对自身高等教育模式的欣赏，在推广其知识与教学传统的过程中，也一再宣示它们的真实意图。在长达两三个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学术体系中，“东方”、“中国”都是落后的代名词，需要西方

的“拯救”，需要欧美自由、民主文化的“滋养”。因为在它们看来，只有西方世界才遵从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意旨，才遵循了这个世界应有的理性原则。而要让这种理性原则惠及世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类似西方的大学，让它们成为拯救世界的精神驿站。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以大学、学院和相应的学位、课程为关键词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但被建立起来，而且确实成为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文化并逐步走向文明的一种象征。在这一历程中，中国也不例外，甚至表现得更为显著。

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开始着手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领域的改革：既要学习西方，也要保持自身的传统。时至今日，努力汲取世界高等教育的共同经验，并实现中国式的转换与再造，仍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这一历程甚至还会在未来若干年继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机遇面前，深入理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认真思考全球化将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什么，将是关注、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的一项重要责任与使命。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将置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自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产生、形成、发展至今，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一直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主要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为主，鲜有高等教育理念与模式的输出；在对外交流上，也仍以吸纳西方文化、学术和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人员为主，在主动展示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魅力以及吸纳外国学者与学生方面还不够自信。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固然要求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置身于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之中，但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高等教育也必须尝试创造出能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共同财富的有益经验。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学会走出去，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成就和创造力，展示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的美妙变奏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魅力所在！

是为序。

华东师范大学 副校长

庄辉明

2008年4月

序一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陈永明

制度是人们行为的规则，制度影响人们的行为，不同的制度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不同的激励或制约作用。改变制度意味着改变人们的行为规则，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大学制度是基于大学的理念而设计的，调整着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以及大学内部各组织之间的关系，规定着大学人员的行为方向和行为方式。大学制度对于大学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产生之初，由于处于社会边缘，没有走入社会中心，从而成为一个由学者组成的高度自治的“象牙塔”。随着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人们对大学提出的要求逐渐增多，大学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从教学发展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再发展到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等），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大学受到来自社会、教会以及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也越来越多，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自主与法人地位遭遇冲击与挑战，大学学术探究的自治与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对高等教育地位和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学术界对于维护大学自主与自治的呼声逐渐高涨。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够确保大学自主办学、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有效调节、社会积极参与的大学管理制度，也就成为各国学者和大学管理者密切关注的课题。为规范政府办学行为，保护大学应有的自主与自治权，同时满足政府和社会对大学提出的合理要求，有效调节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人们发现，赋予大学法人资格与地位，建立与实施大学法人制度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之一。各个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大学法人制度实施的环境不同，大学法人的属性和地位也各有自己的特点。虽然我国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赋予大学以法人地位，在实践中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和探索，

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为了解决大学体制僵化的问题以及减轻国家行政和财政体制改革的压力,规范政府和大学的办学行为,更好地平衡“求心力”(高度监控与规范统一)与“远心力”(下放权责与自主创新)的关系,社会各界为推动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作出了长时间的努力和探索。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议题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到2003年《国立大学法人法》正式实施,中间经过了近30年的争议和讨论。即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讨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算起,到正式实施,也经过了近10年的争论和研讨。日本国立大学进行法人化改革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被称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地震级变革”。深入了解和分析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背景和动因、改革的内容和措施、改革过程中反对的声音和意见、国立大学法人的法律地位、国立大学法人制度实施的效果等,对于丰富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完善我国大学法人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对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背景、过程、内容与措施以及法人制度实施的效果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本书作者田爱丽博士专门去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名古屋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通过大量的文献查阅和多方面的深入访谈,全面地了解、分析了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全貌,并对名古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状况做了个案分析。通过她的辛苦工作,我们可以把握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全貌,对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由此反观我国大学法人制度实施的现状和问题,书中提出的改进与完善我国大学法人制度的建议和措施相当適切。

该书内容属于国别研究和比较分析的范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和借鉴别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别国发展的现状和国情,对于本国发展以及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831年,一位年仅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访问了美国,在美国停留9个多月,收集了大量资料。回到法国后,他撰写了《论美国的民主》这样一本经典著作,对推动法国和整个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为了制定合适的对日政策,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研究日本。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被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

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以及电影,写出了分析日本国民性格的专著《菊与刀》,该著作对美国成功制定对日战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国当今公共管理研究学者毛寿龙也说过,无论多么伟大的国家和民族,都有值得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的极大必要性。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无论一个民族自身拥有一种多么伟大的传统,它依然可以在这个传统上从其他民族学到能够丰富更新这个传统的精华。

尽管中日之间仍有不少隔阂与摩擦,但是不能不承认,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就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距可以从以下几组数据中窥见一斑:1868年,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教育开始学习西方,进入教育近代化进程,1872年,其教育已具有近代化的雏形;我国于20世纪初才开始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1973年,日本开始实施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我国于1993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法律上确立了教师资格制度。战后,日本宪法规定义务教育为免费教育,1947年颁布《教育基本法》规定,义务教育期限为9年;我国1986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法律上规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在义务教育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政策才刚刚开始逐步推广,等等。

当然,借鉴和吸收他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意味着盲目照搬,而先要理解他国实践背后的动因、背景、基本精神和理念,并结合自己本国的实际需要,根据国情有选择地“拿来”。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制度,以为法国提供借鉴和启示时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仿效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适用于我们的东西。”^①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和借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经验时所需秉持的基本理念。

2008年6月24日

① 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

序二 知识人的幸福和大学法人化

[日] 牧野笃

本书作者田爱丽博士是我最为得意的学生之一。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名古屋大学与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刻。她像个小孩子一样,非常紧张,日语也没有掌握好,要说的话什么都没有说出来。然而,她的那种紧张而谦虚的态度充分表现出她本人对学问的热忱。我认为,全世界的知识人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学生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无论是年纪小的还是大的,如果他(她)对学问抱有热忱,真的要探索真理,我们就应当携起他(她)的手,共同到真理之林去寻找学问之心。

光阴似箭,那样一个惴惴不安的田同学已经成长为博士。我完全能够想象她在这一段发展的时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危机。每次遇到挫折的时候,她都会得到以陈永明教授为代表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们的帮助和鼓励,从困难和危机中摆脱出来,负重走过了艰苦的学问之路。她本人也在每次克服困难和危机时,进一步接近真理之源泉,最终发现了她本人的学问之光。

田同学离开我这里已经有几个春秋,但是我们之间的确有师生之情。因为,我作为日本的导师之一,在接收田同学时就感受到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所抱有的一颗学问之心,同时感受到我本人作为知识人的幸福,今天看到我得意的学生倾其心血的作品,又感受到她艰苦的学问之路,并感受到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幸福。这就是大学教师的幸福。

在日本大学 130 年的历史,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化可以说是第三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在日本近代化初期,即明治时代,日本打破封建将军统治的政治制度,重新建设君主立宪制和中央集权制的文明国家。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国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学校教

育制度,向法国和美国学习基础国民教育制度,开始将群众培养成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国民;另一方面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并在日本国内加以培植,培养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级统治人员,即高级官僚和高级技术人员,于是就创办了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一整套帝国大学制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到20世纪初期,日本已经成为亚洲强国,与西方先进国家比肩。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也曾走过错误的发展之路,无法回避军国主义的抬头和国民对国家发展的骄傲意识的高昂,发动了对周围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终于导致自身的破坏。曾经那么发达的文明国家归其自身为一片焦土和灰尘。在这一过程中,以帝国大学为核心的日本的大学没有很好地起到牵制政府发动战争的作用。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在大学里反对政府发动战争,一些学者客观地预测到日本战败的可能性,但是没有能够抵制军国主义的疯狂和国民赞成发动战争的舆论,甚至有极少一部分知识分子支持政府开战,于是日本终于发动了侵略战争,除了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造成很大的灾难以外,也对日本本身造成了彻底的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从反省这种战前和战争中日本政府与国民的意识、态度出发,重新建设和平和民主的、发达的、文明的国家。肩负这一重任而站起来的就是战后的大学。这是大学制度的第二次改革。大学的第二次改革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对帝国大学进行改造,将它改组为为了国民的幸福和人类的福利进行研究和教育的场所,以及将高度研究的成果传授给广大国民的开放的最高学府。第二,创办很多新的大学,向广大国民开放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第三,建设从小学直到大学的一贯制学校教育体系,否定高等教育的特权性,将高等教育改组为国民教育的一个环节,等等。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学,比如名古屋大学,具有“和平宪章”等规定,约束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不允许在校的学者进行有推动战争可能性的研究。

战后的日本作为言论自由的国家,虽然在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加上一些政治家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提出较敏感的历史问题,伤害了周围亚洲国家和地区群众的感情,但是,总体来说,日本人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都反感爱说好战言论的政治家。这种感情是出于他们的亲身体会的。比如说,我的外

祖母一代都经历过过去日本发动战争的时期，即战前和战争中很残酷的时期。日本战败后已经过了40年的时候，我有过如下经历。我是自1985年秋天至1987年秋天在中国南京大学留学的。留学之前，我去外祖母家看她。那时候，她已经患了较严重的老年痴呆症，连人也认不出来。所以，我以为即便我告诉她去中国留学，她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她的反应与我预测的完全相反。一听我去中国留学，她就开始大哭大骂：“我的丈夫被征兵到中国大陆去战死，连他的骨头也没回来。我长女的丈夫被征兵去南洋，战死了，留下年幼的孩子。我三女的丈夫也被征兵到中国大陆，日军战败后被苏联军送去西伯利亚，被强迫从事重劳动，战争结束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天呀，这次我可爱的孙子也要被征兵去那里。老百姓生多少孩子，都被国家浪费掉。”之后，1987年我从中国留学回国后，到她家去报告归国时，她满面笑容地说：“你退伍了吗？可喜可喜，婆婆放心了。”

战后建设和平国家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政策反映了老百姓的这种感情，得到广大国民的支持。战后的日本奇迹般地复苏并发展了经济，终于建设成高度文明的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广大国民厌恶战争和追求和平的愿望，以及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和加强国民的认识能力，以抵制极右派在政治上起作用，并建设民主社会这种国民精神的运动。在此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是大学。大学一方面作为先进科学和先进文化的圣地，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良心的根据地，与群众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为建设富裕的、发达的、和平的、文明的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日本的繁荣可以说是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发展带来的。

在日本大学的历史中，前半世纪是大学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和贡献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国家目的而存在的时期，也是大学无法抵制国家发动战争的时期。然而后半世纪是大学为了建设和平民主的文明国家，作为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文明的圣地，作为社会良心的核心，为了建设和平和发达的国家，发挥了积极的变革作用。因此，可以说大学在战前和战后有很大的区别。日本的大学为了日本重生为和平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虽然说大学的第一次改革时期与第二次改革时期有很大的隔断，日本也从全体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立宪君主制国家转变为和平民主的高度发达的文明

国家,但是二者间也有共通点或连续点。也就是说,从国家的体制来看,战前的日本所采取的国家体制与战后的日本所采取的国家体制,可以说有共通的目的和性质,即在经济上谋求发达的近代产业社会的性质。也可以说,战前和战后的日本社会虽然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有很大的断层,但是其社会的性质或目的并没有变化,都是根据以制造业为中心的近代产业社会的发展模式,谋求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丰富。也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大学从其产生到第二时期的终结这一过程中,一直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日本的大学在第一和第二时期,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可以说并没有变化,即都作为社会的领先者,主导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社会开始进入高消费社会或所谓大众信息化社会。这时,价值取向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动,“消费”取代了“生产”,整个社会的价值失去了其核心或向心力和其阶层性的秩序,开始出现多样化和多元化,并导致所有价值的平等化和相对化。这种社会可以说已经失去其中心,在政治上,中央集权制开始崩溃,必须推行地方分权;在行政上,政府行为所能够起作用的范围开始缩小,必须鼓励公民参与行政并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在经济上,产业社会的崩溃导致以往安定的雇用制度的解体,而必须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保障群众参与就业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求职的结果都被归为个人的责任。而且,这种社会是已经发展到了顶峰的日本产业社会,及其与由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所导致的经济全球化互为表里地产生的新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最重要的不是“积累”,而是“流动”或“流通”。价值不是来自创造或生产和长期积累,而是来自差异和流通,并且是暂时堆积的,差异和暂时堆积是流通创造的。

在这种社会,所有以往的东西开始崩溃,比如社会的权威和秩序开始被平等化和相对化以及网络化所取代。在平等化和相对化以及网络化的社会,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价值的判断者,也可以成为价值的发现者;可以成为对以往权威的攻击者,也可以参与改造以往的权威而把它平等网络化,并可以成为吸收并欣赏所有的价值的消费者。

知识也不例外。引进先进的东西,在某种场所将它保存并积累下来,由专门人员将它传授给广大群众,这种场所叫做大学,这种人员叫做“知识人”,大学和知识人的地位高,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和标志。这种社会在日本早就已经

过去。在目前的日本社会,民众一方面要求大学发挥创造价值的作用,但不是要求所有的大学都起到这种特殊的作用,更多的是要求大学在新的信息化和消费社会里,促使将广大群众中产生和流通的信息加速流通,从而成为信息网络的交叉点。

在此,以往的所谓“知识权威”的结构开始崩溃,大学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面临这样的改变,必须改造其存在的意义,从在产业社会中积累和传授知识的场所,转变为在大众消费社会里流通信息并将知识出售给消费者的场所。知识也已经不是由知识人创造出来并传授给公众,期待公众利用知识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而是由所有的人评估并通过信息网络普及到社会所有的地方,并被公众消费的商品。

在这种知识商品化的社会,大学无法保留自己以往的运作方式、教学方法以及研究方式。大学面临这样的挑战:必须毁掉自己以往的知识权威的形象和制度,将知识商品化并“出售”给广大消费者,接受消费者的评鉴,得到社会的支持。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是日本大学的第三次改革,我认为这是日本大学在其130年的历史中最为重大的改革,也可以说日本大学的存在意义和存在根据以及存在的性质都需要改革。仅仅看日本社会的表面,没有战争时整个社会的动荡,没有自军国主义转变为民主主义那种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动,没有翻天覆地,社会非常安定,人们也很平安地生活。但是,在这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背后,改变以往人类构筑的社会框架并寻找新的社会框架的革命正静静地进行着。为了更好地迎接这一人类史上的大变动而进行的改革之一是国立大学法人化。因此,我在此可以说,我们是日本大学在其130年的历史中处于最大过渡时期的目击者。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在制度上的改革和运作方式中,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看本书。田博士根据具体的材料精细地描写了日本大学法人化的每一个层面,内容很丰富。学生已经超过了老师。

下面我想试图描写田博士没有指出的日本大学法人化的一些侧面,以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如上所述,日本大学法人化是日本社会发展和变化以及全世界发展和变化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命运,并更好地实施和实现。但是,制度的改革也好,人们意识的改革也好,在过渡时期

往往会出现之前没有预期到的事情。尤其是,制度的改革并不仅止于此,而是与运作制度者的观念和感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社会是人的集合体,既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又是被人约束其发展的。日本大学的法人化也是如此。目前我们面临的⁷最大问题是,法人化影响到每一个教师对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影响到他们对学术研究和学生教学的兴趣,似乎降低了他们的工作效益。

这与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作为大学教师的幸福感有关系。日本的大学在其130年的历史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的办学模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德国学者洪堡(Wihem von Humboldt)所提倡的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观点。洪堡是18世纪后半叶德国最伟大的知识人之一,语言学者、政治家,也是洪堡大学的创始人。洪堡尊重人的自由和理性,重视大学陶冶人格的功能,主张人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为人,在真理之源泉面前,不得不谦虚地意识到自我是小小的存在,从而不得不再次去寻找真理,这就是人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他要求国家权力应该保障大学研究和教学的自由,保障大学教师将本人探寻到的真理传授给学生的自由。这种大学办学的规律与产业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德国或日本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规律也是完全符合的。

日本的大学也采取了这种观点,在大学里,教师引进世界先进的学术成果并进行研究,或寻找真理并开发新的理论,之后将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期待学生毕业踏入社会后,将先进的研究成果普及到社会中。因此,在这样的大学里,大学教师既是研究者又是授业者,承担着这两种角色。大学教师在社会上被期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以及正义感去寻找真理,并乐意将其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并培养学生成为良好的社会成员和学间接班人。在这种学问研究和教学的循环机制中,教师不知不觉地进一步探索真理,学生也不自觉地感受到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被陶冶成健全的市民。

在这种良好的研究和教学的循环机制的背后所存在的是知识的发现和积累,以及传授产生价值的这种产业社会的知识结构。所以,大学教师能够获得社会的尊敬。以往的社会中,日本的大学教师,无论是帝国大学的教师还是其他私立大学的教师,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敬,他们怀着自尊心去寻找真理,而且在这种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没有预期到的新的东西,这又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促进他们探索真理。那时候,学生既是教师教学的对象,又是寻找真

理的同行。我本人在与田博士交流时所感受到的幸福,是从这种师生关系中产生的。

与此相反,高度消费的社会将知识与真理区别开来,即将教学与研究区别开来,要求极少数的研究型大学从事探索真理的工作,其他大多数大学从事知识教学工作。在此,消费社会的观念中发生双重“商品”的概念。第一知识是“商品”这种概念。在此观念中,知识不是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被挖掘出来的、与真理有密切关系的或由真理构成的东西,而是现成的、在书本上已经存在的、谁教都是一样的东西。因此,教学工作也被视为将现成的知识传达给学生的、由谁来教效果都一样的、规范化了的活动。每一个教师的创造和独创都无法存在,都需要根据规定进行。在此,发生了第二个“商品”的概念:学生也是大学制造出来的“商品”。可以说,高度消费社会中的大学是将“商品”的知识传达给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并接受“消费者”的评估,因此需要“商品”传达活动即教学活动的标准化。同时,大学将学生输出给社会。在此意义上说,学生也是“商品”,社会是“消费者”。大学为了更好地制造其“商品”,即学生,并输出给“消费者”,即社会,就必须根据社会的要求将其第一次“商品”的知识规范化和标准化,将教师的教学方法规范化,制造标准化的“商品”,即学生。

在此,法人化了的大学不得不采取第三方评估的方式约束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在产业社会洪堡模式的大学中,最关键的是研究与教学的统一,但是统一的方法都不得不由每一门学科的逻辑来决定,无法标准化。而且,这种无法标准化的真理的探索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给学生良好的影响,成功地培养出市民社会健全的成员和科学研究的接班人。也可以说,“不可视”的部分有很大的作用。但是,高度消费社会要求所有的教学活动规范化、标准化、数量化,因此,社会第三方评估不得不采取评估“可视”化的方法,并要求教师教法的规范化,而容易忽视学科固有的逻辑的存在。

在这种大学,教学工作开始失去其快乐,与制造业大工厂里生产规范化的商品一样,变成单调的无味的日常活动。在此过程中,教师开始失去作为知识人的自尊心,也开始失去作为知识人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观念。这种教师无法将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人。

反过来看,那些极少数的研究型大学也发生着同样事情。因为在这些研究

型大学,研究和教学开始分离,社会要求大学教师进行研究工作并产生作为“商品”的知识。在此,已经不存在师生共同探索真理的快乐,也不存在发现没有预期到的东西的快乐,更不存在通过教学活动感受到自己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幸福。研究工作在此也不是探索真理的精神活动,而是产生“商品”的规范化活动。

这样,目前在日本的大学法人化中所发生的是促进日本高等教育的崩溃的危机性问题。在我看来,日本的大学已经陷入社会变动的要求与大学本身的研究和教学的逻辑之间造成的恶性循环,并开始自动崩溃的机制。

这是大学改革在过渡时期一段时间内的问题,还是大学改革根本性的结构性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更好地处理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关系,并恢复或重建大学教师研究和教学的快乐机制。

或许我讲得太悲观了。但是,我作为旧式的知识人相信,只有科学的和客观的悲观才可能产生主观的和主动的乐观。

我认为,读到这本书的中国大学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可以将日本的经验作为他山之石,从而充满信心和乐观。

2008年7月24日

目录

Contents

序一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陈永明 1
序二 知识人的幸福和大学法人化	[日] 牧野笃 4
绪论	1
第一章 现代大学与法人制度	7
第一节 大学法人与大学自主权	9
第二节 大学法人与外部的关系	12
第三节 大学法人内部治理	17
第四节 大学法人属性和相应的法律规范	21
第二章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动因与背景	25
第一节 日本国立大学自身的制度性疲倦	27
第二节 日本经济界的强烈要求	31
第三节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努力	35
第四节 国际环境的驱使	39
第五节 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压力	41
第三章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内容与措施 ——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47
第一节 日本国立大学与文部科学省关系的变化	49
第二节 日本国立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55
第三节 大学评价制度及与此相关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58